

博覽會政治學：中國治理周邊關係 的新模式？

楊昊*

摘要

當代大型博覽會多半以科技、經濟或環境為主題，展示人類社會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更被視為是「帝國主義的祭典」。本文將以博覽會政治學為題，探索博覽會作為政策工具所呈現出的特殊權力圖象，透過中國經略周邊區域的戰略安排為例，並以中國—東協博覽會作為經驗參照，深入解釋中國如何以博覽會的舉辦來發展、運作對周邊關係的實際操作。本文主要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前言，主要針對中國崛起的文獻進行扼要分類；第二部分探討博覽會政治學作為強權興起政策工具的意義；第三部分以中國的經驗參照，作為博覽會政治學的再理論化依據；第四部分透過中國—東協博覽會的個案討論此一大型會展的起源、發展與戰略布局；第五部分則為結論。

關鍵詞：中國、中國—東協博覽會、東協、博覽會政治學、權力政治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投稿日期：2013年11月25日；採用日期：2014年1月18日

doi:10.3966/2311505X2014020101006

Journal of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February, 2014, Vol.1 No.1, pp. 143-167

The Politics of Exposition: A New Governance Modality of China's Good Neighbor Policy?

Alan Hao Yang*

Abstract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are of specific themes, for example, in accordance with scientific,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ubjects. They are regarded as the exhibition of human progress, and, to some extent, the representation of imperialism as well. By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ASEAN Expo, this paper is aimed at delineating the tactic how China develops it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n neighbors. The first par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rise of China. Secondly, it touches upon the internal rationale of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as the way to promote the rise of great power. The third part makes sense the theorization of the exposition politic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s case. Then, it corroborates the case study of China-ASEAN Expo to depict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c arran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ASEAN relations. The fifth part conclud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Keywords: China, China-ASEAN Expos, ASEAN, the politics of expos, power politics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3966/2311505X2014020101006

壹、前言：中國興起與向外擴張的再理解

近年來，中國挾著全方為影響力的快速興起，逐漸形塑出促使國際體系變革的關鍵動力。此種源自政權維穩、確保內部社會秩序，乃至於發展外向輻射的權力關係，逐步擴散到全球政治、軍事與安全、金融與貨幣、經濟與貿易、非傳統安全、社會文化等領域。崛起的中國不只是國際政治的重要現象，更改寫了後冷戰世界政治經濟史，同時也重新帶動亞洲的崛起，將亞洲推向國際政治的前沿。¹ 中國與亞洲的雙重崛起，引起國際學界的高度重視，而國際社會該如何理解中國的內政與外交治理邏輯，亦成學術研究與政策探索的核心關注。回顧近期探討中國崛起情勢的研究文獻，本文認為其中存在至少四種研究理路，分別關注興起中國的「新影響說」、「新動力說」、「新平衡說」及「新施為說」。

首先，以「新影響說」為主要關切的研究文獻多半探索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對全球與特定區域的影響力。相關論者深入評估中國崛起之政經勢力，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議題上的影響力；更有研究從文明過程的對照觀點，檢視中國化（Sinicization）如何展現出相對於歐美西化對於全球影響的不同圖象與路徑。²

其次，「新動力說」的專著則是特別關注國際體系內對抗力量之間的競合關係。其中有不少論者主張，中國的崛起代表亞洲海權大國的躍進，甚至將對現有西方國家主導國際體系的閉鎖權力結構進行逆襲。類似的論述顛覆了過去歐美海權大國（美國、英國）對抗亞洲陸權大國（蘇聯、中國）的分明結構。更有甚者，這些亞洲的海權，不唯獨中國，就連南亞的印度、東南亞的印尼等新型海權大國的快速崛起，都可能將改寫亞洲與全球的新權力結構（Sakhuia, 2011）。

如果中國與其他亞洲海權國家挑戰現有的國際體系結構，那麼國際社會如何發展、醞釀出足以控管大國關係、緩解潛在衝突的機制或制度設計，有其迫切需求。當然，這也間接導引出研究中國崛起的第三種觀點：「新平衡說」，相關論者特別關切現狀霸權（the status quo hegemon）美國與修正型

¹ 由國際金融政治研究權威學者 Cohen 主編的新書，即針對亞洲大國如何在國際政治經濟議題中施展權力、發揮影響力進行深度比較研究。其中 Cohen 教授所撰寫的〈中國人民幣國際化長征（long march）〉一文，即說明了中國如何透過人民幣政策的制定，試圖影響國際貨幣政治的走向（Cohen & Chiou, 2013）。

² Katzenstein（2012）曾以「中國化」作為文明進程的研究參照；另外，針對中國崛起對於周邊區域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評估與批判性分析，亦可參考 Hsiao 與 Lin（2009）。

強權 (revisionist power) 中國之間的互動與競合關係 (Odgaard, 2007; Zhu, 2006)。³ 特別是當 2013 年美國總統歐巴馬 (B. Obama) 與習近平在加州進行「歐習會」時所提出的「新型態大國關係」，隨即成為國際學界與中、美政策社群就現有的大國關係該如何管制、如何推動實質合作、建立戰略互信的辯論焦點 (Glosserman, 2013; Lampton, 2013; Ren, 2013)。除此之外，亦有研究站在非對抗面的立場，建議美國應該要重新理解中國，並且發展建設性的合作關係，以避免美、中對抗性新冷戰的形成 (Gross, 2013)。

最後，要瞭解中國崛起的實貌，研究者有必要從北京對外戰略的作為與布局著手。近年來陸續有研究文獻深入瞭解中國對外戰略的新舉措，本文將相關研究成果歸納為「新施為說」。中國的崛起將形成新的權力體系，透過金援、對外投資、國企、人民、孔子學院 (Confucius Institutes) 等海外布局來拓展北京的全方位影響力，形成獨特的「中國式的全球化」(Chinese globalization) 圖象。⁴

上述四種不同的主張，扼要地勾勒出近期中國政經實力向外擴張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導向。本文認為，無論研究者探討的焦點在中國的新影響力、新動力、平衡新局或新施為，對於北京而言，如何持續性地提升其影響力並擴展全球布局，找到足以含納中國穩定崛起的立足點，才是政治菁英所關注的焦點。其中，鄰近的東南亞成為北京自 1980 年代開始以「周邊為首要」的新外交政策核心要件，也被視為是支撐中國快速興起、走向全球的戰略腹地。

當前針對中國對東南亞關係的研究文獻猶如汗牛充棟，研究者亦持續地探索北京經略周邊區域的新政策工具或新治理思維。探討「中國式」的對外政策舉措在學理與經驗層面上，對於當代治理研究的知識累積來說甚為重要。特別是依循前述第四種研究理路「新施為說」的專書與論文，嚴肅地檢視中國採取哪些新政策施為及其對周邊區域安全的衝擊、討論北京如何靈活運用多元的經濟戰略來達成特殊政治目的，或者深入探索中國國際形象的改造路徑，均具備與當前國際研究理論對話的意義 (Jones, 2013; Kang, 2007; Storey, 2011)。本文認為，類似的新布局施為與舉措大多蘊含著戰略雙重性 (strategic duality)，亦即一方面被視為是執行中國走出去外交的戰略工具，另一方面則具有強化內政

³ 近年來，亦開始有論述強調「中、美之間在關於全球穩定與繁榮的各種重大議題上，肩負起重要的責任」(黎弘、劉易斯·鄧恩、拉爾夫·科薩，2013)。

⁴ 在近期出版的相關文獻中，經濟影響力與經貿安排的操作是一大重點，如 Cheung 與 de Haan (2013)、Huang 與 Yu (2013)。另外，中國的全球布局亦可參見 Shambaugh (2013)、Sun 與 Lancaster (2013)。在區域方面的影響力探索新作，可參考楊昊 (2013a)、楊昊與蕭新煌 (2011)。

的發展意涵。其中，以中國邊緣城市為基地向周邊區域擴大合作網絡的「博覽會」(exposition, Expo)，正是整合中國外交與內政開發的新治理工具，同時亦為本文的研究旨趣。

當前中國對周邊國家設有三個重要的區域博覽會，分別是中國—東協博覽會 (China-ASEAN Expo)、中國—南亞博覽會 (China-South Asia Expo) 及中國—亞歐博覽會 (China-Euro Asia Expo)。這三個博覽會展示了中國以亞洲周邊為首要的外交戰略，並凸顯了東南亞、南亞與中亞的重要性。特別是東南亞與南亞兩大博覽會所涉區域重疊在緬甸，更揭示了中國對於周邊國家積極布局緬甸的加碼回應。近年來，北京陸續透過促進貿易、加碼投資與強化招商的多元政策，希望能具體地營造出「面向（周邊）社會」的新政策方向。

為了更準確地探索北京如何透過「博覽會」來經略周邊關係，本文以 2004 年正式成立，目前最具規模的中國—東協博覽會為例，探討隱含在其中的博覽會政治學，並據以分析中國如何發展及運作對東南亞周邊關係的經略治理工具。本文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前言，主要針對中國崛起的文獻進行扼要分類；第二部分主要探討博覽會政治學 (the politics of exposition) 作為強權興起政策工具的內在理路；第三部分從經驗個案分析中國—東協博覽會的起源、發展與戰略布局；第四部分則為結論。

貳、大型博覽會作為強權興起的政策工具

回顧歷史，傳統歐美大國在快速掌握權力資源後，均會採取不同的方式向國際社會展示其政治威望，並據此維繫或強化現有的強權地位。⁵ 在此之中，由強權國家所主辦、帶有特定目的的「博覽會」，藉著廣邀全球社會的參與，展示大國自我詮釋的人類文明與進步、展現己身科技創新的力量、並且展演大國文化藝術的內涵，多元並進地具體形塑出以大國為全球權力核心、大國首都為全球焦點的宣傳方式 (propaganda)，讓國際社會見證大國時代的到來。

十九世紀中葉起，如英國在 1851 年於倫敦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以及法國在同一時期多次舉辦的大型國際博覽會，便是英、法兩強將倫敦與巴黎打造成全

⁵ 例如，十五世紀的英國在確立海權霸主地位後，便在殖民地建立了貿易體系與基礎建設，一方面向當地社會展示英國的優勢，另一方面亦實質地延續了海外殖民帝國的經貿連結版圖。另外，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國，在 1947 年透過《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 向受到戰爭侵害的歐洲國家提供經濟援助，使得相關國家能夠在短時間內快速復甦。

球之都的重要安排。博覽會後留下的著名建築物如水晶宮 (Crystal Palace)、艾菲爾鐵塔 (Eiffel Tower) 更被視為是強權領銜時代的歷史遺緒。甚至在 1928 年，超過 30 個國家在巴黎簽署《國際博覽會公約》，隨後設置國際博覽局 (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Expositions, BIE) 管理各類博覽會的執行。⁶ 儘管相關展演均以文明、文化與當代工藝科技為名，但實際上卻充分展示出大國如何譜寫歷史、創造世界政治新局的能量。博覽會的發展見證了大國崛起與追求更多權力的歷程，而博覽會內容的日新月異，同樣也說明了它不單只是一場以商業或文明為主題的展覽活動，其目的更不在於娛樂 (to entertain) 公眾，而是希望藉著隱含在會展背後的政治操作，達到強權預期的戰略目的。

本文認為，要瞭解博覽會運作的箇中政治學，必須要先理解博覽會的三個重要功能，這三項功能均與大國興起的發展戰略有關，分別是：爭取國際矚目、展示國力及展現強國戰略的權力政治意圖。首先，在「爭取國際矚目」方面，韓國曾在 2012 年舉辦了世界博覽會 (World Expo 2012)，別稱「麗水博覽會」 (Yeosu Expo)，其以「活力海洋與海岸」為主題，這是史上第一個以環境與海洋為主題的世界博覽會。⁷ 麗水博覽會呈現人類社會如何回應全球金融海嘯與全球氣候變遷的雙重挑戰，藉此也展現出韓國希望爭取國際社會對永續環境治理與海洋治理的關注，藉著群策群力、共思解決之道，轉換成促進和平的能量。當然，韓國也希望能藉此提升己身在相關議題上的戰略能量與論述權。在舉辦會議期間，縱使全球世界經濟陷入低靡，但仍有超過上百國與重要國際組織願意參與此一盛會；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更揭示了《麗水宣言》，使得博覽會不僅具有展演娛樂、展示科技的活動，更具有號召國際關注、反思人類發展對於環境影響與威脅的內涵 (“South Korea Gears Up for World Expo,” 2011)。

其次，在「展示國力」方面，於 1901 年舉辦的泛美博覽會 (Pan-American Expo) 之目的，正在於展現西半球在十九世紀快速發展的進步圖象。泛美博覽會涵蓋範圍包含了中美洲、南美洲、墨西哥、美國與其海外殖民地 (new possessions, 如菲律賓、古巴等)。儘管是區域性的博覽會，但仍希望藉著展示各種建築、商業與工業活動，試圖向國際社會展演當時美洲文明的進步，甚至企圖預示未來的二十世紀將會是美洲的世紀 (Anonymous, 1901, p. 89)。不過，

⁶ 請參考 <http://www.bie-paris.org/site/en/>。此一政府間機構將博覽會定義成兩個範疇，一者是世界型的一級博覽會 (Universal / Class I)，另一種則是被列入國際型／特殊型的二級博覽會 (International / Specialised / Class II)。

⁷ 請參考麗水博覽會官方網站，<http://eng.expo2012.kr/main.html>

到了二十一世紀，國際情勢有了明顯的改變。2010年，於上海舉行的世界博覽會（以下簡稱世博）被譽為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博覽會，過去的世博系列多半由已開發國家或歐美先進國家舉辦；然而，上海世界博覽會的主辦單位卻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尚未開幕之前，中國國務院發布了一篇新聞稿，提到上海世博將「向世界展示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燦爛文明，新中國60年的波瀾壯闊，改革開放30多年的輝煌成就，還有中華兒女為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的恢弘氣概」，它所肩負更重要的目的是「再次推動中國從大國到強國的跨越」（〈上海世博開啟中國時間，助推從大國到強國跨越〉，2010）。的確，中國藉著世博的舉辦，高調宣示投入超過450億美元的資金；當時適逢全球金融海嘯期間，歐美先進國家均陷入經濟低靡情勢，而中國所投注的龐大財力顛覆了「開發中國家」經濟能力受限的刻板印象。在博覽會進行期間，北京更號召全球各國積極參與盛會，其大規模的刻意宣傳，在某種程度上意在向外闡述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中國的世紀。

最後，由大國所主導的博覽會，多少希望「呈現強國戰略與特殊的權力政治意圖」。十九世紀下半葉，全球性的博覽會大多著眼於科技與美術的推廣，藉以彰顯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如1789年，法國的內政大臣François de Neufchâteau提議聚集當地的藝術家與製造商，以一種創新的公共展演方式來呈現法國工藝產品。此一建議被當時的法國皇室接受，並且持續舉辦類似活動，1789年僅有110家廠商參展；到了1849年，已經超過4,400家（Poisson, 2005）。在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巴黎於1855～1867年先後主辦了多場大型國際博覽會。拿破崙三世樂見相關國際博覽會豐富巴黎的人文與社會地景，其目的除了提升法國國際聲望、振興法國商業利益，更帶有確保巴黎作為世界首都的政治意圖。

十九世紀到二十一世紀間的各種大型博覽會，充分展現了主辦國爭取國際矚目、展示國力及展現強國戰略的權力政治意圖的功能。不過，這些以經濟、文化、藝術或環保的大型展演活動，究竟如何與權力政治的累積有所關聯？又如何能具體累進國家追求大國地位的能量與聲望？其內在運作理路為何？均值得進一步細探。

參、博覽會政治學的再理論化：中國經驗的參照

回顧國際學術界針對博覽會進行研究的文獻中，可以發現類似的知識累積多半出現在美學、藝術或歷史領域的期刊上，較少有政治學者或國際關係研究社群的理論化探索。在既有的文獻中，日本學者吉見俊哉（2010）的《博覽會的政治學》最具代表性，同時也是最多研究者參考、引述的經典。

吉見俊哉（2010）的專著論理清晰，強調由大國舉辦的盛會可被視為是「帝國主義的祭典」；在此前提下，博覽會不僅是工藝的展現，更是帝國權力的展示。吉見俊哉對於博覽會所進行的理論化指陳，主要以社會學的凝視概念或帝國主義的再現進行商品、儀式與視線的分析，並且將傳統帝國（英、法）與新興大國（日本）的承襲精神與脈絡進行經驗參照與比較。相較之下，本文則採取不同的研究理路。本文的核心旨趣並非探索存在於博覽會展演中的歷史質性 or 大國儀式，而是希望重新檢視大國如何藉著舉辦具有特殊戰略意涵的博覽會來經略周邊關係，將其打造成協助大國崛起或再興的政策工具。

本文認為，大國之所以會舉辦國際型的博覽會，乃是受到國際與國內需求所驅動。如果我們將博覽會視為大國政治操作的政策工具，將更能理解商業展演背後所存在的戰略安排與權力政治議程。不可諱言地，對於主辦國而言，一場「面向國際」的博覽會絕對不只是為期數十天的單純商業或展覽活動；舉辦博覽會的目的更不是冠冕堂皇地追求榮耀，正如同十九世紀的英、法兩強、二十世紀的美國及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成功舉辦每一場大型國際博覽會的安排均希望能滿足大國崛起的特殊戰略考量。

一般而言，這些考量具有「時間性」與「空間性」兩種意涵。首先，就時間性來說，舉辦博覽會耗時甚久，其後續影響時程則更為深遠。舉凡會前的議程設定與爭取主辦權的運作、準備與籌辦工作，到展覽舉辦期間的各項活動與宣傳，都經過國家機器的精密政治盤算。當博覽會結束後，主辦國政府更希望能保持會展期間的熱度，一方面持續累積主辦國的國際聲望，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從博覽會遺緒中爭取更多的發展紅利。

再者，從空間性的角度而論，博覽會的舉辦被視為是滿足國家內部與對外關係治理需求的戰略舉措。例如，有不少主辦國將會展舉辦在首都，猶如過去的英、法強權，便是期許能將倫敦與巴黎兩座首都打造為世界之都。另外，若主辦國將會展安排在首都之外的都市，其目的更在於均衡區域發展並凸顯主辦城市的特色與功能。以中國在近年來所積極推動的各種大型博覽會為例，從其設

置的位置與功能可以發現，這些會展其實被北京視為是執行中國新睦鄰外交政策「與鄰為善、以鄰為辦」及「以周邊為首要」的具體實踐（王逸舟，2008，頁3）。中國在烏魯木齊、昆明及南寧分別設置中國—亞歐、中國—南亞、中國—東協博覽會，主要考量是藉著會展的制度化與定期舉辦，將鄰近中亞的烏魯木齊、鄰近東南亞的昆明與南寧打造成新的邊區經濟中心，藉以強化位處內陸城市的開發力道。從這些經驗中，確實可以發現中國外交戰略中的博覽會政治學，不僅將會展本身操作成政策工具，在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打造有利於國內經濟建設與改革開放的國際環境」的雙重需求（張蘊嶺、周方銀，2008，頁31），並且強化了「地方國際化」的能量（蘇長和，2008，頁240-265）。

儘管如此，單從「時間性」與「空間性」兩個面向，仍不足以理解博覽會政治學的箇中運作理路。透過以中國過去所推動的主要博覽會為經驗參照，本文發現博覽會之所以被大國所重視並轉換成大國崛起的重要資源，主要包含了四項元素：持續性的誘因提供、功能性的轉向領導、政治性的合作保障，以及操之在我的親疏遠近關係經營。

首先，展示並提供持續性的誘因是博覽會主辦國拉抬大國聲勢的重要舉措。每逢博覽會舉辦期間，主辦國除了大幅宣傳會議的主題、理念與活動內容外，更刻意彰顯與會人數、參展廠商數目、雙邊投資項目與合約的數目及金額、達成交易與貿易量等數據。透過這些每年不斷翻新、持續成長的數值，再現了主辦國的重要地位與強大影響力。舉例來說，在2013年6月首度舉辦的中國—南亞博覽會所釋出的新聞稿中，展示了此一新興博覽會吸引並促成了不少投資計畫，在會展中通過的投資合作計畫達到467項（國內合作409項、國際合作58項），總簽約金額高達5,956億人民幣。透過中國—南亞博覽會的媒合，中國與南亞國家及企業之間的合作程度與規模更較以往成長許多（張子卓，2013）。同樣在2013年舉辦的第三屆中國—亞歐博覽會，從官方訊息中亦傳達了會展促成165項投資合作計畫的成果，總簽約金達2,132.19億人民幣（〈第三屆亞洲博覽會內聯項目集中簽約2,132.19億〉，2013）。數字會說話，無論是中國—南亞博覽會或是中國—亞歐博覽會，逐年成長的經濟數據與投資指標，都將轉換成有助於拉抬主辦國（中國）國際聲勢的持續性誘因。

博覽會政治學的第二項元素，在於以功能性的合作倡議來降低對中國威脅的疑慮，藉此轉向形塑出不同的領導權與信任感。Rozman（2004, p. 120）認為，中國的國家認同具有頗為複雜的內涵，特別自1990年代起，存在於中國國家認同中的「大國認同」（great power identity）逐漸浮現，並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然而，這種大國認同卻也伴隨著「中國威脅論」的出現而受到質疑並備受挑戰，這使得中國不得不透過各種政策宣示來降低國際社會（特別是周邊國家）對於中國是否斷然崛起（assertive rise）的疑慮。誠如 Kurlantzick（2007, p. 6, 160）所言，北京藉著快速興起的經濟實力，轉譯成消費購買力、投資能力與援助能量，進入不少開發中國家，而這些國家認為藉著貿易、投資、接受援助等方式與北京搭建起經濟連結，將獲得更充分的發展空間與機會，有些周邊國家甚至將中國視為是「應許之地」（a promised land）。就此，中國得以將「強國追求大國地位的政治實力」（the political capacity of great power）轉換成「買家的權力」（the power of buyer）；當中國逐漸成為絕大多數亞洲國家商品與半成品的主要購買者的同時，正如同 Lampton（2008, p. 89）所言，在這些國家的眼中，北京的形象早已從過去的敵對共產勢力轉換成當前的經濟成長推手。換言之，這種藉由博覽會展示經貿與投資等功能合作所形成的和諧光暈，早已蓋過中國威脅的恐懼與憂慮，進而正面累積了北京在追求大國地位的聲望與能量。

博覽會政治學的第三種元素，指的是由政府領導人與政治菁英所確保的合作保障，將成為未來共同發展的路向與憑藉。對於主辦國而言，大型的博覽會必然是難得的國際宣傳工具，無論是商業的、文化的會展，政府的領導人或核心成員都不會缺席。以上海世博為例，在會議籌備初期，中國外交部指派一位正司級官員協調與會國的會展業務，其後更提升到副部級的外交部官員統籌管理（〈明報：上海世博首務，推銷大國形象〉，2010）。事實上，政治菁英除了在協調工作與議程設定上扮演要角，尤以政治領導人的參與及支持，更將提升博覽會所提供的持續性誘因，並且為博覽會所啟動、強化的各種合作關係提供政治保障（political assurance）。例如，在2009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尚未建成之前，中國與東協國家的雙邊貿易總額約為2,130億美元。在2012年，習近平參與第九屆中國—東協博覽會時，宣示了未來中國與東協的貿易總額將朝2015年達到5,000億美元為目標（當年的中國—東協貿易額已經突破4,000億美元）。隨後，在2013年舉辦的第十屆中國—東協博覽會中，與會的中國總理李克強在開幕演講中更進一步宣示未來中國與東協的貿易額將以2020年超越1兆美元為目標（潘旭海，2013）。根據統計，2013年前三季（1～9月）中國與東協的貿易額達到3,223.6億美元，而雙方投資累積亦已突破1,100億美元（石岩，2013）。一般預期，2013年的全年貿易往來數據將超越4,000億美元的門檻。中國—東協博覽會儼然成為中國領導人為雙邊關係設定新里程碑的重要平臺，有了領導人的加碼，確實有助

於強化中國國內企業與東協政府及廠商合作與投資的信心，進而具體反映在成交總額與計畫總數的逐年增加上。

最後，本文認為，博覽會的舉辦（特別是中國的經驗）呈現出大國特有的親疏遠近關係的經營戰略。特別是主辦國對周邊區域的經營與睦鄰政策的展現、針對主題國的禮遇、各國領導人的邀訪與會談，甚至對於挑戰勢力的回應與處理，都具有指標性意義。一般認為，博覽會旨在營造特定議題上的合作、共贏氛圍，不過，主辦國的邀請安排其實深具政治意義，特別是面對與己身有利益衝突的國家，究竟是否邀訪或如何安排會展活動都成為外界動見觀瞻的焦點。最明顯的例子，即第十屆中國—東協博覽會中，北京未邀請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三世（Benigno Aquino III）的決定，多少呈現出中國在面對其他南海主權爭議國的立場，此舉多少帶有刻意的懲罰性或制裁性意涵（楊昊，2013b）。

透過上述探討，本文試圖聚焦在博覽會政治學的誘因提供、合作促進、政治保障與關係管理四個面向，希望能提供若干理論化貢獻，具體呈現大國如何將博覽會操作成推進強國興起的政策工具。就中國推動大型博覽會的實際運作經驗中，特別在於親疏遠進的關係管理方面甚具研究旨趣。事實上，過去極少有文獻針對此種具備特殊戰略意義的懲罰性安排深入分析；有鑑於此，本文擬就以舉辦 10 年、目前最具規模的中國—東協博覽會作為個案，探討此一超越經貿合作內涵的周邊治理戰略。

肆、中國—東協博覽會：超越經貿合作的周邊治理戰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 年 10 月 24 ~ 25 日的「中國周邊外交工作會議」中，特別強調周邊外交的重要性，並設定了未來 5 ~ 10 年內的整體戰略。他認為，經營好周邊外交將有助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讓中國的發展惠及周邊國家」。中國與周邊區域及國家的互動，因為經貿聯繫的加深而更為密切；當然，這也使得北京必須即時提升戰略安排的主動性。對於北京來說，藉著既有的經濟、貿易、金融與科技等優勢來深化周邊合作關係，顯然是核心戰略。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對於周邊外交戰略未來路向的期許儘管全面，但從他的談話中，還是可以發現首要目標還是意在「使周邊與中國政治關係更加友好」，這也代表著無論是經濟、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最終目的仍然著眼於促進政治互信與深化政治友好（錢彤，2013）。

在中國所推動的各種睦鄰外交戰略中，尤以中國—東南亞關係最具代表性，無論在多邊制度的成果方面或是雙邊合作的深度上，均被北京視為是睦鄰戰略的樣版。從 2004 年開始舉辦的中國—東協博覽會是中國面向東南亞、經略多邊與雙邊關係的一項政策工具。首先，此一大型會展由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在 2003 年的中國—東協高峰會（ASEAN+1 Summit）中提出的大型會展計畫，從一開始即被定位成中國與東協共同主辦的招商投資計畫，並非由中方獨力舉辦。⁸ 溫家寶的政治考量在於藉著形塑出中國與東協鄰國間「平等」、「互惠」的互動關係，淡化大國與小國的權力不對稱關係與周邊國家的恐「中」憂慮。類似的合作成果同樣展現在其他由中國與東協「共同倡導成立」各種新的平臺上，如中國特意選擇在 2011 年的東協日（8 月 8 日）於北京成立的「中國—東協中心」（ASEAN-China Center）便為一例（母耕源，2012，頁 321）。中國—東協博覽會舉辦迄今已有十屆，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曾經表示，此一會展的內容與倡議早已超越了商貿的範疇，更擴及到雙方在文化、教育與社會方面的種種連結（徐蕊，2013）。事實上，本文認為，中國—東協博覽會作為強化中國治理周邊關係的新政策工具所揭示的特殊意義與政治意涵，更值得細探。

一、博覽會的長期舉辦強化了中國提供的持續性誘因

從中國—南亞博覽會（目前為止只辦理一屆）、中國—亞歐博覽會（辦理了三屆）所提供的會展數據，或許無法展示何謂「持續性的誘因提供」的實質內容。相較之下，從 2004 年舉辦迄今的中國—東協博覽會所累積的投資與經貿合作成果，則更具說服力。首屆的中國—東協博覽會公告達成合作計畫者有 231 項，簽約金額為 472.8 億人民幣（郝亞琳、華春雨、劉媛媛，2004）。經過 10 年的時間，在 2013 年舉行的第十屆中國—東協博覽會，主辦單位揭示了年度成果共有 167 項合作計畫（國際 73 項、國內 94 項）通過，投資金額超過 1,000 億人民幣。相關報導特別強調國際項目的平均投資規模（1.2 億美元）和中國企業與東協國家的簽約金成長比例（30%）（管浩，2013）。

整體來說，中國官方公布前九屆博覽會的國內、外投資項目超過 30,000 項，國際合作計畫的總金額約為 573.76 億美元，國內投資合作計畫的金額更高達 5,561.14 億美元（中國—東盟博覽會秘書處，2013）。從參展的中國與東南

⁸ 中國—東協博覽會之主辦方為中國商務部、東協秘書處與各國商務、工業或貿易部門，同時委託廣西承辦，其永久會址設在南寧市。

亞廠商的數目來看，在 2004 年僅有 1,505 家，2013 年增加到 2,364 家（參見圖 1）。從發展趨勢的角度來看，在博覽會通過的推動雙邊投資合作與促進國內企業「走出去」布局的國際合作計畫案，從 2004 年的 129 件（49.68 億美元）一度成長到 2012 年的 182 件，隨後在 2013 年下滑到 73 件。然而，從總金額的規模來看卻是呈現大幅度的成長（86 億美元），這也說明了國際合作計畫的規模正持續擴大（參見圖 2）。其次，在會展中最受矚目的商品貿易部分同樣也持續增長，整體交易量從 2004 年首屆的 10.84 億美元，逐步增長至 2012 年的 18.78 億美元，2013 年的表現則是稍微下降為 15.97 億美元（參見圖 3）。值得注意的是，由中國—東協博覽會所提供的持續性誘因，並非只針對國外廠商與投資者，對於國內的廠商而言亦極具吸引力。在會展中通過的國內合作計畫案的質與量同樣持續增加，從 2004 年的 102 件（485.4 億人民幣），逐年增長至 2012 年的 104 項（802.12 億人民幣），隨後在 2013 年減少為 94 件合作案，總值 681 億人民幣。這些數據藉著參與會展的中、外媒體的上萬篇報導，確實轉換成會展引進外資、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促進雙邊合作的持續性誘因（黎黎，2005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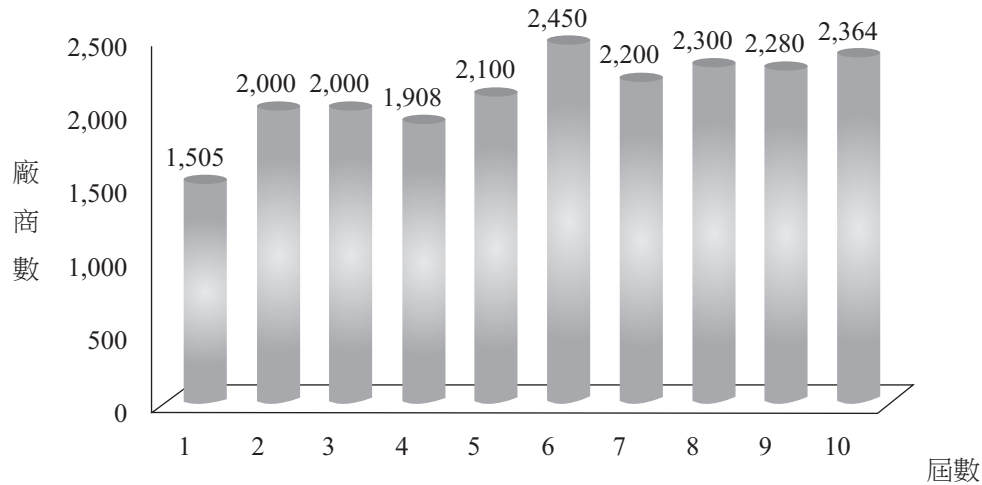


圖 1 中國—東協博覽會參展廠商數（2004～20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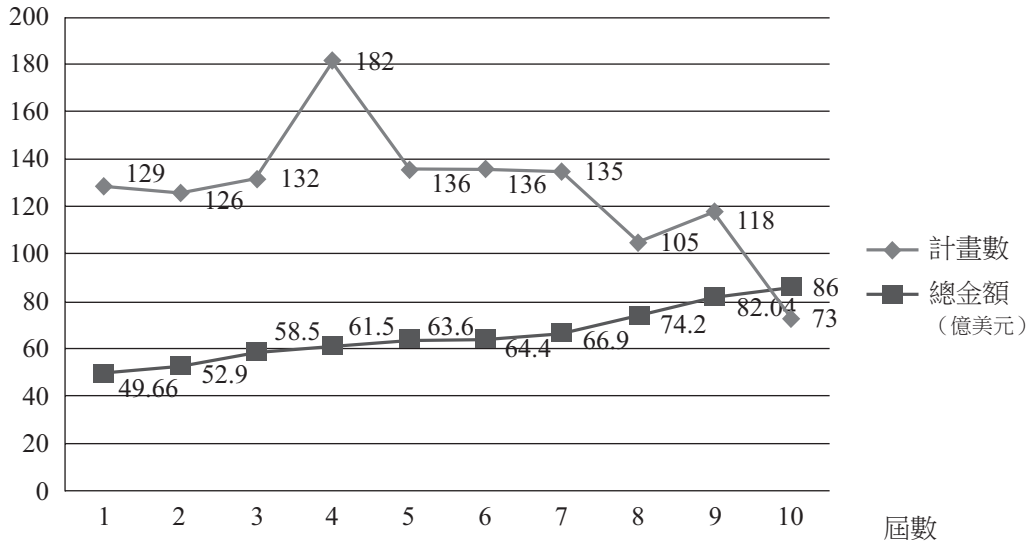


圖 2 中國—東協博覽會國際合作計畫與總金額 (2004 ~ 20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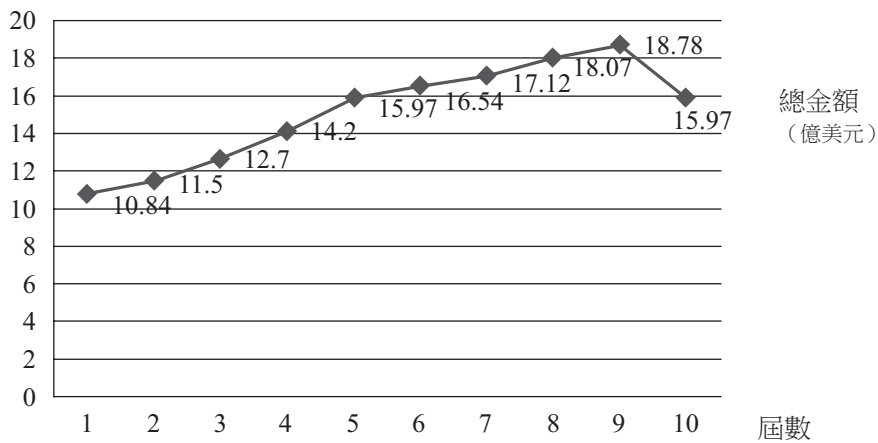


圖 3 中國—東協博覽會商品貿易額 (2004 ~ 2013 年)

二、博覽會以廣泛功能性合作試圖沖淡中國追求區域領導權的意圖

每年舉辦的中國—東協博覽會，儘管看似以經貿、商務與投資為主要關注，同時亦關照參展國家的個別多樣性；不過，到了 2007 年後，會展開始制度化固定的展覽專區，如商品貿易、投資合作、先進技術與魅力之城，⁹ 同時也創設

⁹ 魅力之城是從東協與中國的城市中選出推廣觀光與旅遊的年度重點城市，在會展中設定專區介紹。

「主題國」(country of honor) 與「會議主軸」。以主題國為例，第四屆至第十屆的主題國分別是汶萊、柬埔寨、寮國、印尼、馬來西亞、緬甸及菲律賓，即將在 2014 年擔任主題國的則是新加坡。自同年起，會議主軸開始聚焦在中國—東協合作的 11 項核心領域，從 2007 年開始的「港口合作」，後續分別以「訊息通信合作」、「海關與商界合作」、「自由貿易區與新機遇」、「環保合作」、「科技合作」及「區域合作發展：新機遇、新動力、新階段」為主軸。

從具體的發展來看，這些超越純粹經貿，並朝向多樣性、廣泛功能性的合作領域，在戰略上的確有助於沖淡中國與周邊國家存在的不對稱權力關係，同時成就中國經略周邊關係的各種基礎建設。不過，本文認為，這些安排最主要的功能還是在於透過前述持續性誘因的展示，將北京打造成東南亞與東亞經濟成長推手的新形象。

這種藉由博覽會展示經貿與投資等功能合作所形成的和諧光暈與成長紅利，確實掩蓋了大國崛起的威脅感，強化了北京低調、平等與良善大國的姿態。特別是東協各國領導人對於中國—東協博覽會的肯定，更轉換成對中國在領導區域經濟上的支持，甚至外溢到區域穩定的宏觀框架中，讚揚中國作為穩定者 (stabilizer) 的領銜角色。例如，高度親中的柬埔寨總理洪森 (Hun Sen) 在 2013 年中國—東協博覽會的發言，便清楚強調「中國已經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復甦的重要區域，其發展為東協帶來了重大的利益，並且成為維護區域穩定的動力」(王軍偉，2013)。

儘管北京在博覽會中仍試圖沖淡追求政治領導權的企圖，但政治與經濟的緊密連結與難以切割，仍可從會展議程與活動內容裡一窺端倪。例如，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末廣招 (Suehiro Akira) 教授特別關注中國—東協博覽會的發展趨勢，認為此一會展有兩大功能，其一為打造中國在東南亞的政治與經濟領導權，其二為滿足中國的內部市場與發展需求。每一年的會展同時並列許多的論壇，如第四屆開始的九大論壇、第五屆的十六大論壇、第六屆的十一大論壇等，其所轄領域包含了金融、法律、電信、港口、性別、投資、文化、打擊貧窮、環境、醫療等議題。這些論壇的與會者多半為政府高階官員 (部長論壇)，而其關注焦點更是與東協系列峰會的關注高度重疊。唯一的差異在於，東協系列會議的主導權掌握在東協國家手上，而由中國—東協博覽會所附帶的各項論壇，其議程設定權則是由中國主控 (Akira, 2013, pp. 14-15)。透過隱藏在會議議程與系列活動中的經濟與政治連結，中國積極爭取周邊國家與社會的信任，形塑出「以商促政」的周邊經略操作。

三、政治領導人的參與確保了博覽會所啟動的合作藍圖

既然此一博覽會的設置是面向周邊區域，那麼周邊國家是否積極參與顯得重要。從首屆中國—東協博覽會中所設立的展位數目來看，以泰國、越南及馬來西亞位居前三名；在廠商人數方面，則是以泰國、越南及新加坡為最多，而這也反映在成交金額的排名上。另一項值得關注的指標，是政府代表團的人數，在2004年的博覽會舉辦期間，泰國政府代表團最為龐大（183人），其次是柬埔寨（172人）與緬甸（115人）（黎黎，2005b）。從這些數據中可以發現，與中國保持極為友好關係（如新加坡與泰國）、鄰近的中南半島國家（如柬埔寨、寮國、緬甸與越南，簡稱 CLMV）應該是中國—東協博覽會積極經略、持續深化關係的重點。

根據統計，在2004～2012年所舉辦的九次博覽會中，東協各國領導人來訪人數達70多次，有1,760位部長級官員與會，參加會議者更高達36.8萬人（徐蕊，2013）。根據本文蒐錄各國與會領導人的參與資料中，幾乎每一位東協國家的領導人都出席過中國—東協博覽會，最主要的原因有二：其一，從第四屆開始設置主題國，使得每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都有機會參與系列會展與論壇。其二，透過重大紀念事件的舉辦，如中國—東協對話關係15週年、中國—東協夥伴關係20週年、中國—東協戰略夥伴關係建立10週年等紀念儀式與活動，北京亦有機會邀請到東協各國領導人透過博覽會的平臺進行元首高峰會。

彙整中的資料不謀而合地呈現最支持此一博覽會的仍是中南半島鄰近國家。其中，寮國（總理7次、國家副主席2次、副總理2次）、柬埔寨（總理6次、副總理2次，另外亦包括國務大臣）、緬甸（總統2次、總理4次、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秘書長2次）與越南（總理4次、副總理6次）最為積極，其他與中國關係保持良好的中南半島東協成員國，則是以泰國（總理2次、副總理4次）最受矚目。相較之下，海洋東協國家的領導人可能因為缺乏陸地與基礎建設連結，在發展利益上有所差異，因而使得領導人出席次數較少，如馬來西亞（總理2次、副總理1次）、汶萊（蘇丹1次、王室成員2次）、菲律賓（總統1次、眾議院議長2次）、印尼（總統1次、副總統1次）及新加坡（總理1次、副總理1次），不過，從過去與會名單來看，工商管理部門的高階官員仍相當積極參與系列會議。¹⁰

¹⁰ 資料出處為作者自行整理之「中國—東協複合關係資料庫」。

在博覽會期間，中國高層官員出席的位階包括了中國總理（3次）、中國國家副主席（2次）、中國副總理（5次）、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3次）、中國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2次）等。從北京南下的領導人，在博覽會期間所宣示的各項主張與聲明，均成為區域國家高度關切的重點，也成為中國與東協國家未來合作的重要指標。舉例來說，在2013年舉辦的第十屆中國—東協博覽會期間，中國總理李克強提出了「中國—東協合作五倡議」，其一，建構CAFTA升級版，並且推動服務貿易的談判，強化各項便利化措施。藉著升級版的自由貿易區合作方案，未來將與東協共同推進區域經貿協定的合作，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EC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等；其二，中國將提供新的貸款來推動中國與東協的基礎建設聯繫網絡，更重要的是，要共同打造系列產業園區；其三，中國將強化與東協的金融合作，建立區域金融風險管理機制；其四，中國將與東協推動「中國—東協海洋夥伴關係」，並且建立港口城市網路；最後，將2014年打造成「中國—東協友好交流年」，促進社會與社會之間的文化及人文聯繫（石岩、林豔華，2013）。這些宣示，隨後更轉換成中國經略東協區域與各國的工作重點。

李克強的「中國—東協合作五倡議」看似立基在現有的合作基礎上，其實這些訴求揭示了中國希望在2010年CAFTA建成後至2015年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組成前的過渡期間，定位雙方合作的路向並且勾勒出具體的發展戰略。透過這些戰略的布局與安排，北京試圖滿足東協正在發展共同體的資源、腹地與市場需求。李克強的主張在會展期間轉譯成中國新領導人對東協國家的重視，同時迅速獲得與會東協領導人與商業領袖的肯定（章琪、蔣雪林，2013）。類似的領導人宣示與政策主張，藉著確保性的政治論述，確保了中國所釋出的各種促進貿易、加碼投資與強化招商的多元政策，當然，這也進而鞏固了中國對東協國家在政府與政府之間的互信與友好關係。

四、超越合作圖像的博覽會政治學：從高調懷柔到低調制裁

2013年，中國—東協博覽會舉辦前夕適逢中、菲之間因為南海主權爭端的緊張情勢，因而使得本屆博覽會成為外界所關注的焦點。誠如前文所述，中國—東協博覽會的運作具體呈現出中國特有管理親疏遠近關係的戰略與方式，第十屆的會展更展現出中國除了展示各種對周邊國家的高調懷柔政策外，亦低調

（但卻強硬地）處理合作關係中的「雜音」。

中國從中國—東協博覽會舉辦的過程中，不斷學習如何與周邊國家發展共榮互利的關係，並且試圖打造出雙贏的發展誘因。因此，從第四屆會展開始，中國東協博覽會設定了主題國，以具體從區域經貿與投資合作中明確設定每年的重點，歷年的主題國分別是汶萊、柬埔寨、寮國、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與菲律賓。作為共同主辦方的中國，透過主題國的設定，必然會邀請主題國政治領導人參與會展，一方面展現兩國政治友好的互動關係，另一方面也協助藉著聚焦主題國的投資市場與經貿優勢，協助拉抬聲望並促成更多商機。從過去的經驗中，中國曾邀請過汶萊王儲、柬埔寨總理、寮國總理、印尼總統、馬來西亞總理、緬甸總統等國家領導人參與主題館的揭幕，並邀請相關領導人參與會展的系列活動。唯獨第十屆的主題國（菲律賓）領導人，並未在中國受邀名單之列。北京未邀請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三世與會，而是邀請貿易與工商部長 G. Domingo 參與會議。在主題館的揭幕儀式中，中國代表則是由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出席，而非更高位階的國家領導人。

北京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安排，在某種程度上展現出睦鄰外交戰略中仍有親疏遠近之別。對於中國而言，菲律賓目前的確是健全中國—東協合作關係的內部雜音，它甚至結合了同樣製造雜音的外部勢力，嚴重挑戰了北京與東南亞友邦的合作進展。例如，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海外版）曾在第十屆中國—東協博覽會舉辦前夕，抨擊菲律賓在南海爭端上對天然資源的奪取、聯合美國提升海軍軍備的戰略構想、甚至訴請國際仲裁爭端的片面行為，都「別有用心」地複雜化南海爭端，並且挑戰中國的底線（楊子岩，2013）。

對於菲律賓而言，由於艾奎諾三世在就任總統後僅有一次出訪中國的行程，2013年適逢菲律賓擔任會展主題國，因此艾奎諾三世特別在8月中即拋出參與中國—東協博覽會的意願（Robles & Huang, 2013）。事實上，艾奎諾三世的表態被國際輿論視為有助於緩解中、菲兩造在南海主權爭端上的緊張情勢與低盪關係。然而，北京最後還是以冷處理的方式來回應艾奎諾三世的與會提議（Robles & Ng, 2013），甚至一度傳出中國透過私下管道要求艾奎諾三世延緩或取消訪問中國行程的消息。

中國與菲律賓在此一事件上各持己見，唯一的共同點是雙方都希望捍衛自身的國家利益。菲律賓外交部發言人 R. Hernandez 在菲國媒體上公開指出，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要求菲律賓必須要先撤銷已經提交聯合國的南海島嶼仲裁案，中國才會發出邀請函。不過，有鑑於艾奎諾三世上任後對於南海爭端的鷹派作

法，菲律賓當然無法接受此一「不可能的條件」(impossible condition) (“China Set Impossible Conditions for Aquino Visit-DFA,” 2013)。最後，這也導致了艾奎諾三世無法「獲邀」出席第十屆中國—東協博覽會，當然也無法參與中國—東協戰略夥伴關係 10 週年紀念的各項活動。

對於北京而言，如果擔任主題國代言人的菲律賓總統在沒有撤銷聯合國仲裁案的情況下出席在中國舉辦的中國—東協博覽會，並且出席在中國舉辦的中國—東協戰略夥伴關係 10 週年系列活動，那麼對於北京來說，作為「挑戰勢力」的艾奎諾三世無論是否公開針對南海爭端發言，其本身就是合作主調中的「雜音」。一個與北京意見相左、挑戰中南海核心利益的艾奎諾三世，必然將敗壞 (dishonor) 中國的國家利益，而這正是北京高層所不樂見的。就此而論，艾奎諾三世的缺席，早已預見。

這次拒邀菲律賓總統的舉措，可以當成是中國對於菲律賓的軟性懲罰或制裁。此舉亦彰顯出中國在處理周邊關係時已更具信心，但也揭示了北京逐漸失去對菲律賓艾奎諾政府的耐心。檢視該屆博覽會的各項文件與新聞，可以發現主辦方及中國高層對於拒邀事件與對中、菲爭端的隻字不提，而這也展現出中國新的周邊治理戰略，兼具高調懷柔與低調但卻逐漸強硬的外交政策。本文認為，北京將會把此一事件設定成經略周邊關係的樣版。只要挑戰中國國家利益，必然將被排拒在懷柔合作的議程外，甚至不得其門而入。

伍、結語

中國之於東協，不只是崛起中的強權，更是快速興起的市場與帶動區域整合的發展引擎。兩者之間的關係正進行結構性的改變，從過去的敵對立場，逐漸轉換成緊密的友邦關係。姑且不論這種友誼是否真的如同雙方政治菁英的樣版宣示般完善與理想，不可否認地，中國需要東協作為走出去的戰略腹地，而東協國家的整合也無法排除中國政府與企業的影響力。儘管部分東協國家仍然視中國為國家安全的威脅與挑戰，但顯然無法逆轉整體雙邊關係從「黃金十年」轉換成「鑽石十年」的發展路向。

隨著亞太諸強權積極拉攏東協國家，習近平主政的中國必然會加碼對東協國家的利多釋放，以爭取更充分的區域主導權。特別是自 2013 年起，東協的弱勢領導權 (weak chairmanship) 已逐漸進入中段，緬甸在 2014 年開始擔任東協輪值主席，延續此一弱勢領導的循環；隨後，在 2015 年，在政策立場上同樣親中

的馬來西亞將主導東協共同體的未來進度。從習近平訪馬來西亞時所提出的各項誘因與合作倡議，便可瞭解北京積極拉攏馬來西亞的戰略舉措，均意在延續中國布局東協的「戰略機遇期」。

回顧 2012 年的國際輿論，有不少觀察留意中國在東協內部的結盟活動，特別主張北京正持續裂解東協的整體立場與東協核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不過，當中國自 2013 年開始採取新的戰略，轉而表態願意積極與區域國家對話，並且協商僵持不下的南海爭端。透過各種高層工作會議的召開，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過去封閉、保守的形象。姑且不論這是否是以拖待變的策略運用，但北京的巧妙外交確實亦已造成東協內部的結盟政治勢力開始出現微妙的調整。目前僅剩菲律賓持續公開挑戰中國的南海立場，就連過去積極挑戰中國南海勢力的越南，儘管偶有衝突，但對於北京來說，仍可控制。換言之，此一「對比戰略」已經奏效，只要北京繼續對菲律賓刻意冷處理，並且對整體東協成員在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CoC）的諮商過程中表示熱絡，那麼菲律賓在南海爭議上將很有可能淪為「孤掌難鳴」的絕對弱勢。

本文透過對博覽會政治學的理論化探討與分析，試圖呈現以中國—東協博覽會所形塑出的合作議程，其實只是大國與小國競合關係的片面環節，在某種程度上它清楚揭示了強、弱宰制的權力關係。中國—東協博覽會的持續運作，強化了此一不對稱強、弱權力關係中的誘因供給機制，再加上中國領導高層的政治確保，此一系列會展將大幅提升周邊國家、社會與企業對於崛起中國所代表的商機、市場與各種有形及無形資源的信心。當然，隨著會展規模的逐年擴大與議題範疇的漸進廣納，中國試圖透過超越經貿事務的廣泛功能性合作，有意淡化自身追求區域領導權的戰略企圖。但更重要的是，由中國—東協博覽會所展示的新周邊治理戰略，並不只停留在懷柔睦鄰的溫和形象上，透過 2013 年菲律賓總統未獲邀出席主題國活動的事件，更說明了中國有能力將現有的懷柔戰略轉換、操作成懲罰與制裁的疏遠或隔離政策。

博覽會政治學的運作理路再度確立了一個國際政治現實，也就是當各種權力資源大幅度地集中在強國手上，位於強權羽翼的周邊小國儘管有機會獲得充裕的資源並與強權共織雙贏榮景，但極有可能將因為互（依）賴關係的日益複雜而深受侷限，甚至逐漸喪失對特定國家利益的主體能動性。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上海世博開啟中國時間，助推從大國到強國跨越（2010，1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取自 <http://www.scio.gov.cn/ztk/xwfb/01/10/Document/528889/528889.htm>
- 中國—東盟博覽會秘書處（2013，12月25日）。中國—東盟博覽會五大專題：投資合作。中國—東盟博覽會官方網站。取自 http://www.caexpo.org/gb/zhuanti/11_hangye/investment/index.html
- 王軍偉（2013，9月3日）。柬埔寨首相洪森：中國的發展為東盟帶來巨大利益。新華網。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03/c_117211844.htm
- 王逸舟（2008）。導論。載於王逸舟（主編），**中國對外關係轉型 30 年：1978-2008**（頁 1-25）。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
- 母耕源（2012）。中國與東盟關係：機遇與挑戰並存。載於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主編），**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藍皮書**（頁 316-327）。北京市：世界知識。
- 石岩（2013，10月25日）。泰國副總理：明年將是中國—東協投資貿易又一里程碑。中國新聞網。取自 <http://big5.chinanews.com:89/cj/2013/10-25/5427141.shtml>
- 石岩、林豔華（2013，9月3日）。李克強就加強中國東盟合作提五項倡議。中國新聞網。取自 http://big5.chinanews.com:89/gate/big5/www.gx.chinanews.com/2013/dmnew_0903/76802.html
- 吉見俊哉（2010）。**博覽會的政治學**（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譯）。臺北市：群學。
- 明報：上海世博首務，推銷大國形象（2010，4月29日）。中國評論新聞網。取自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3/0/5/1/101305185.html?coluid=93&kindid=5670 &docid=101305185>
- 徐蕊（2013，3月20日）。中國—東盟博覽會意義已超越經貿。新華網。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asean-china-center.org/2013-03/20/c_132247080.htm

- 郝亞琳、華春雨、劉媛媛（2004，11月6日）。中國東協博覽會投資項目簽約踴躍。中國—東盟博覽會官方網站。取自 http://www.caexpo.org/gb/news/special/huiguzhuanti/shengkuang/t20041106_40463.html
- 張子卓（2013，6月13日）。南博會招商引資近6千億，簽訂投資合作項目467個。新華網。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yn.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3-06/13/c_132451128.htm
- 張蘊嶺、周方銀（2008）。中國與鄰國的關係。載於王逸舟（主編），**中國對外關係轉型30年：1978-2008**（頁26-51）。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
- 章琪、蔣雪林（2013，9月4日）東協政商界人士：李克強發言更堅定東盟與中國互信。中國新聞網。取自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9-04/5246620.shtml>
- 第三屆亞洲博覽會內聯項目集中簽約2,132.19億（2013，9月5日）。中國新聞網。取自 <http://www.caexpo.org/new2013/56410.jhtml>
- 楊子岩（2013，8月3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和東協合作是必需而非可選，應排除雜音干擾。中國新聞網。取自 http://big5.chinanews.com:89/gate/big5/www.gx.chinanews.com/2013/attention_0831/76512.html
- 楊昊（2013a）。東協與中國的次區域合作經驗：大湄公河經濟區。載於林佳龍等（主編），**打破悶經濟：新區域主義的動力學**（頁211-233）。臺北市：秀威資訊。
- 楊昊（2013b）。中國大陸—東協的博覽會政治學。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3年9月號**，26-29。
- 楊昊、蕭新煌（2011）。觀察亞太和平與安全的新因素：中國與日本的東南亞柔性權力外交。載於林正義、歐錫富（主編），**2009亞太和平觀察**（頁23-83）。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管浩（2013，9月4日）。第十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簽約總金額突破千億元。新華網。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9/04/c_117231687.htm
- 潘旭海（2013，9月3日）。李克強出席第十屆中國—東盟博覽會開幕式並演講。人民網。取自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03/c1024-22794472.html>
- 黎弘、劉易斯·鄧恩、拉爾夫·科薩（編著）（2013）。**建構長期穩定、合作的中美戰略關係**。北京市：世界知識。
- 黎黎（2005a，7月12日）。15,176篇稿件遠揚博覽會美名。中國—東盟博覽

- 會官方網站。取自 http://www.caexpo.org/gb/news/special/huiguzhuanti/digitalexp/t20050712_43809.html
- 黎黎 (2005b, 7月12日)。首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統計數據 (表)。中國—東盟博覽會官方網站。取自 http://www.caexpo.org/gb/news/special/huiguzhuanti/digitalexp/t20050712_43807.html
- 錢彤 (2013, 10月31日)。習近平部屬未來5-10年周邊外交工作。新華網。取自 <http://www.caeexpo.org/new2013/56629.jhtml>
- 蘇長和 (2008)。中國地方的國際化。載於王逸舟 (主編), **中國對外關係轉型30年：1978-2008** (頁240-265)。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

二、外文部分

- Akira, S. (2013). The China-ASEAN Expo and China's new role in Southeast Asia. *Social Science Japan*, 48, 12-15.
- Anonymous (1901). The Pan-American Exposi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 1(12), 859-860.
- Cheung, Y. W., & de Haan, J. (Eds.). (2013). *The evolving role of China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UK: MIT Press.
- China set impossible conditions for Aquino visit-DFA. (2013, September 2). *Inquirer*. Retrieved from <http://globalnation.inquirer.net/84751/china-set-impossible-conditions-for-aquino-visit-dfa>
- Cohen, B. J., & Chiou, E. (Eds.). (2013). *Power in a changing world economy: Lessons from East Asia*.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losserman, B. (2013).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Hardly*. Retrieved from <http://csis.org/publication/pacnet-40-new-type-great-power-relations-hardly>
- Gross, D. (2013). *The China fallacy: How the U.S. can benefit from China's rise and avoid another Cold War*. New York, NY: Bloomsbury.
- Hsiao, H. H., & Lin, C. Y. (Eds.). (2009). *Rise of China: Beijing'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uang, Y. P., & Yu, M. J. (2013). *China's new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Jones, D. M. (2013). *Asian securit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n an age of volatilit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Kang, D. (2007).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 Katzenstein, P. J. (2012). *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Civilizational processes beyond east and west*. New York, NY: Routledge.
- Kurlantzick, J. (2007).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London, UK: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mpton, D. M. (2008). *The three face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mpton, D. M. (2013).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 ties. *Asian Policy*, 16, 1-18.
- Odgaard, L. (2007).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ia-Pacific security: US-China policies on regional order*. New York, NY: Routledge.
- Poisson, G. (2005). *1855, France's firs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napoleon.org/en/reading_room/articles/files/479453.asp
- Ren, X. (2013). *Model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A Chinese viewpoi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asanforum.org/modeling-a-new-type-of-great-power-relations-a-chinese-viewpoint>
- Robles, R., & Huang, C. (2013). *Philippine President wants to attend ASEAN Trade Expo in China*.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mp.com/news/asia/article/1296718/philippine-president-wants-attend-asean-trade-expo-china>
- Robles, R., & Ng, T. (2013). *China snubs Philippine President over visit to Nanning Expo*.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300512/china-snubs-philippine-president-over-planned-visit-nanning-expo?page=all>
- Rozman, G. (2004). China's quest for great power identity. *Orbis*, 43(3), 119-140.
- Sakhuia, V. (2011). *Asian maritime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Strategic transactions: China,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Shambaugh, D. (2013).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uth Korea gears up for World Expo. (2011, December 19). *Euronews*. Retrieved

from <http://www.euronews.com/2011/12/19/south-korea-gears-up-for-world-expo>

Storey, I. (2011).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a: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Sun, J. M., & Lancaster, S. (2013). *Chinese globalization: A profile of people-based global connections in China*. New York, NY: Routledge.

Zhu, Z. Q. (2006).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Power transition and peace*. New York, NY: Routledge.

